读史札记

圆明园营建始因新考

李大平　朱诚如

圆明园作为一座清代皇家园林，它是大清历代皇帝们的豫游临御之所。可是，圆明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和人类文化的遗产，它却为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所共有。它肇起于康乾盛世，焚毁于咸丰十年秋。纵观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史，皇家苑囿的兴衰往往伴随着一个王朝的存亡。如秦之阿房、宋之艮岳。圆明园的命运也大抵如此。所不同的是，圆明园的影响更为深远，以至于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中国人对它的焚毁仍彻骨铭心。这是由于它正处于东方西方文化的交流、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碰撞的初始时期，而且它本身恰恰就是这次“交流”与“碰撞”的触点而不幸焚毁。何以至此，是文化的鄙陋？还是文明的落后？总之，圆明园作为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于一身并为西方文化使者所盛赞的中国古典园林，它的兴衰存亡就不仅仅只关乎一个大清王朝的兴亡，还关乎整个中华民族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文化与文明的兴衰蜕变。而由它引起的中国人对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或继承、或扬弃的思辩至今还在继续。由此可见，圆明园的兴衰对国人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以往历代皇家园林对国人的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圆明园的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对于挖掘和发现其内在的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史料的匮乏，目前我们仅对圆明园始建年代的认知还未十分清晰。诚如圆明园问题专家张恩荫先生所讲：“圆明园究竟始建于清代康熙哪一年？史料中未见确切记载，历来说法不一”。[①]很长时间以来史学界大多认为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然而，近些年来由于发现了一些相关史料，故又有许多学者认为圆明园当建于康熙四十六年。那么这两种说法那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是否还有第三种可能？当然，要想最终确定圆明园的始建年代还必须拥有更多直接而有力的史料和更深入的研究。

虽然许多直接的档案记载已经湮灭，使得就圆明园而研究圆明园存在很大困难，而把圆明园放在清朝历史的大背景中，将同时代的相关史料一并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看清圆明园的真相并能够得出一个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本文正是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更广泛的深入研究，使我们首先对有关圆明园始建年代的诸多说法提出质疑。

一、对圆明园始建年代存在疑问的辨析

查阅以往的记载，上自清代，下至民国以来凡纪传“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者，其依据大都来源于《日下旧闻考》[②]所载：圆明园“康熙四十八年所建”。比如(清)吴长元的《宸垣识略》及(清)徐珂《清稗类钞·圆明园》等对圆明园的叙述都是根据《日下旧闻考》的记载抄录而成。

(一)《日下旧闻考》未给出“四十八年所

[收稿日期] 2009-04-05
[作者简介] 李大平 (1963—)，男，吉林烟草工业公司长春卷烟厂工艺美术师、吉林艺术学院讲师，长春 130062；朱诚如 (1945—)，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 100080

建”的依据

《日下旧闻考》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弘历令窦光鼐、朱筠等对朱彝尊所著的《日下旧闻》[3]加以增补、考证而成，于敏中任总裁。这本书一方面为我们留下乾隆年间圆明园真实而宝贵的记载，但另一方面又由于其中关于圆明园方面的记载仅是依据雍正的《圆明园记》、乾隆的《圆明园后记》、乾隆御制诗及圆明园册（笔者按：此“圆明园册”是《日下旧闻考》的主要依据，它晚于乾隆九年《四十景图咏》，迄今未见）。而不论是《圆明园记》还是《圆明园后记》，都没有对建园的时间和原因作明确的说明和记载。

首先，雍正《圆明园记》未说明圆明园始建于那一年。雍正在《圆明园记》中开篇即讲：“圆明园在畅春园之北，朕藩邸所居赐园也。”随后又讲康熙每于“熙春盛暑（之际），时临幸焉（注：这里指的是幸畅春园）。朕以扈跸，拜赐一区。园既成，仰荷慈恩，赐以园额曰圆明”。[4]在这里雍正并未讲出是哪一年的“熙春盛暑”，也未说明“拜赐一区”是哪一区。而从后文引证的史料来看，康熙四十六年，康熙是在胤祉、胤禛等七个年长皇子共同奏请下，将畅春园北面一处“空地”同时“赏与尔等建房”，而并非厚此薄彼，单独赏给胤禛一人。总之，雍正是以一个既非常模糊又夸大其辞的表述方式来说明圆明园的建园的时间、地点及缘由。

其次，对于雍正的这段话我们还有一个疑问，那便是“赐园”与“赐地建园”在概念上应有所区别。“赐园”当有“园”在先，后因故赏赐。据周维权所著《中国古典园林史》[5]中第331页的注释：“‘赐园’是清代皇帝赐给皇族、宠臣的园林，不能世袭。园主人死后，仍由内务府收回。若其子得宠，可以再赐”。清代中后期皇亲国戚的园林大都如此。此外，便是“赐地建园”。康熙年间畅春园周围所建诸多花园大都如此。从雍正的《圆明园记》来看，亦属“赐地建园”。可是雍正的“朕藩邸所居，赐园也”和乾隆在《圆明园后记》中讲“昔我皇考因皇祖之赐园，修而葺之”，两者均强调是“赐园”而非“赐地建园”。此外，鄂尔泰等《御制圆明园图诗注》中也说：“我世祖宪皇帝葺圣祖仁皇帝赐园以为豫游临御之所，尝御制为记，备述缘始。”[6]言外之意是有“园”在先而后赏赐。如果有“园”在先，那么，此园先为谁所有？

（二）康熙四十六年所建并非圆明园的前身

关于圆明园始建年代争议的起因缘于康熙四十六年的几段有关圆明园的相关记载。一是有一份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七位皇子奏请在畅春园周围赐地建房的折子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一是《实录》四十六年十一月已有记载“胤禛恭请上幸花园进宴”。如果说四皇子胤禛的这个“花园”指的就是圆明园的话，那么圆明园就不应是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而是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2007年10月18日圆明园学会召开的“纪念圆明园建园300周年”便源于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诸皇子赐地建房的奏折。这是目前学术界对圆明园“康熙四十八年所建”说提出质疑和争议所在。

可问题的关键是，没有任何直接而可信的史料来证实，胤禛在四十六年建的“房”就一定是他后来拥有的所谓“赐园”——圆明园。即便《圣祖实录》记载：“己未，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恭请上幸花园进宴”[7]，但它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幸“圆明园”进宴。

然而，至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引用这段史料的学者无不认为此次胤禛所建即圆明园，并推定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其实，这仅是一个先入为主的“合理”的推论，它的逻辑是：既然公认圆明园是胤禛的赐园，那么，胤禛于康熙四十六年在畅春园附近建的“房”或“花园”就是圆明园，既然如此，圆明园就应当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王戎笙《清代全史》第四卷第四页上所载的一段史料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胤祉的另一个奏折全文抄录如下，以便深入地考证。

《清代全史》上所载的一段史料：“四十六年正月十八日，胤祉、胤禛等七个年长皇子‘奏请于畅春园附近建房。’康熙降旨：‘（畅春园）北面新建花园以东空地，赏与尔等建房。’后因‘若于此处盖建七人之房屋地方，稍有窄

小，故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禟）奏闻父皇后，于此处建房了 ’”[⑧]。此段史料为著名清史学家王戎笙先生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中亲自译校过来，似属可信。

笔者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抄录的另一段史料：

>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臣胤祉谨奏：窃于今年正月十八日，臣等奏请在畅春园周围建造房屋，皇父御赐北新花园迤东空地，令臣等建房。臣等同勘，若建七人房屋，地方似觉窄狭，故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具奏皇父，在此地修建房屋。时臣等曾言另寻地再行具奏。今臣胤祉我买得水磨闸东南明珠子奎芳家邻接空地一块。看此地方，距四阿哥建房一带近，且地处现开浚新河南岸，系皇父游逛之路，地亦清静，无一坟冢。臣望将此建房之地，亦交付佛保绘制图样，呈皇父阅览。再目下正值砖瓦木石雇工价贱之时，预备诸物较易。故臣及时谨奏。请旨。朱批：好。”[⑨]

以上两则史料相互印证，可以确定的是，胤禛同其他六位皇子所建之房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我们假设胤禛所建之房就是圆明园，那么通过探讨其他六位皇子所建之房在哪里？规模有多大？应该会使问题更清楚。

在后一奏折中表明地址方位的有多处，一是从“今臣胤祉我买得水磨闸东南明珠子奎芳家邻接空地一块”；二是“看此地方，距四阿哥建房一带近”。所以，只要知道水磨闸在哪，就知道了明珠子奎芳家和胤祉的房建在哪里，这便容易推知四阿哥的房建在那里。

1、水磨闸和三皇子胤祉建房所在地

据《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三《长春园》，“长春园本圆明园东垣外隙地，旧名水磨村”。另据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考按：（畅春园内）大小河数道，环流苑内，出西北门五空闸达垣外，东经水磨村趋清河，西流则由马厂注入圆明园”。

另外，通过明珠的自怡园亦可确定水磨村的位置。据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310页所载“自怡园是康熙时大学士明珠的别墅园，遗址在清华大学西校门北、水磨村偏南的一带地方”。焦雄在《北京西郊宅园记》中也讲：“清华大学西校门内这处遗址是明珠自怡园遗址，因它相距南大河仅有数十米远，可引水入园，地处水磨村偏南，水磨村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村名”[⑩]。

至于揆方为明珠三子，据年羹尧所撰墓志铭所载：“揆方，字正叔，今予告太师明公之第三子也……生于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十四日不起。配郡主和硕康亲王之女。（揆叙）常语人曰：‘余久在外，所恃以慰吾亲者，以有吾弟耳’。公于太师公朝夕起居，平泉绿野，过从与俱。”从这则记载中可知揆方是一极孝顺之人，按理说他应与其父明珠住在一处以侍奉起居。可是，揆方作为和硕额驸，其礼遇应使他拥有自己的府邸——“揆方家”。而且，胤祉在此提到的是“明珠子揆方家”。可见，揆方家与明珠的自怡园不是一回事。总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奎芳（揆方）家在圆明园的东南水磨村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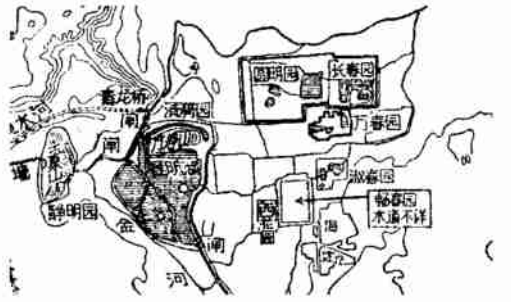

图1

明确了水磨村的位置后，应该可以断定“水磨闸”的位置。因为“旧名水磨村”是以“水磨”而闻名。对此，曹汛在《自怡园》中引用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十七《雨窗遣兴示恺功》诗云“鸡鸣觉村远，水响知石触”等后说：“万泉河水流湍急，可触石作响，当地人遂利用水力推动转磨，水磨村名盖以此也”。[⑪]故此，由水磨村和水磨闸可以确定胤祉建房选址在圆明园东南方向。

2、四阿哥胤禛等四位皇子建房非在圆明园位置上

以上我们确定了胤祉的园子所在，又由于胤祉特意强调“看此地方，距四阿哥建房一带近”；同时又有“故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

十阿哥具奏皇父，在此地修建房屋”一句。由此可知，四位阿哥的房是建在一处。对此，杨珍在《反太子派成员综述》中也有认同，“一废太子前，皇四子胤禛、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 3 人十分要好，无论京城府邸或京郊别墅，无不毗邻而建”。⑫所以，若知道其中一位的所在便可推知其它。

据张宝章在《圆明园始建年代的探讨》中所说：“位于畅春园北墙外、挂甲屯村东的允禟赐园彩霞园，即后来的蔚秀园所在地”。⑬对此，康熙五十二年扬州盐商程庭的《停骖随笔》有文“苑后则诸王池馆，花径相通”⑭可为佐证。总之，几位皇子不论是京城府邸还是京郊别墅都毗邻而建。所以，如果能够确定胤禟的彩霞园在畅春园北墙外，那么，也就确定了四阿哥胤禛等几位皇子所建之房也在畅春园北墙外附近，而不在圆明园的位置上。

3、从建房所需时间的短暂和占地面积“窄小”质疑七位皇子所建之房不是圆明园

首先，从建园所需时间上看，从四十六年正月八日“奏请于畅春园附近建房”至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恭请上幸王（花）园，进宴”仅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这中间包括选址、设计、备置物料、施工营造、内外装修，其中胤祉仅选址就用去了三个月。可见用于建房的时间之仓促，其级别、规模也不会很大。然而，圆明园并非如此，它自康熙末年至雍正初，“亭台丘壑悉仍旧观”，一脉相承，期间未经任何巨变和重组。而且，它浑然一体的疏朗而阔绰的布局与恢宏的帝王气势都决定了它必将是一个耗时漫长的御苑工程。所以，几位阿哥于仓促匆忙间建造的房屋不可能是圆明园。

其次，从建房占地面积来看，假如康熙将圆明园所在地“赏与尔等建房”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仅圆明三园中的圆明园即占地 200 多公顷，合 3000 多亩地，怎么能说“若建七人房屋，地方似觉窄狭”呢？事实上，自康熙二十六年畅春园建成，至康熙四十六年七位皇子建园之时，在畅春园周围，已布满了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园林别业，如索额图的花园（澄怀园的前身）、明珠的自怡园、佟国维的佟园。据钱金甫《佟园记》所载“国戚佟公独密迩御园，踞最胜，其下以次棋布，皆上意也……地可数百亩。”⑮佟园既占地“数百亩”，几乎与畅春园相当。此文写的还是康熙三十一年前的情况。此外，据清戴璐《藤阴杂记》卷十二：“明太傅珠自怡园延唐东江、查他山课子揆叙，唐有《园居杂咏》十四首，如‘楼头花萼连藩邸，地接枌榆总旧勋’”。⑯由此可知，在水磨村还有亲王的藩邸与明珠的自怡园相连。不过这个藩邸应该不是雍亲王等兄弟的藩邸，而是早一辈藩王的藩邸。

所以，康熙“赏与尔等建房”之地的确非常小，以至于挤不下七位阿哥，无奈其中三位阿哥只好另找地方建房。在这样小的地方建起的房子其地位和规模怎么能和圆明园相比？那么，早期圆明园的规模又有多大？

（三）康熙年间早期圆明园的规模的界定

对此，笔者认为收录于《雍正御制诗文集》卷二十六中的“雍邸集”之六的“园景十二咏”诗，以及雍正的其他相关诗词可以清晰地说明早期圆明园的规模。因为，这是雍亲王雍邸园居时所写。探究这十二景的位置，有益于界定康熙年间圆明园的规模范围。

1、关于“园景十二咏”所咏园景所在地

此“园景十二咏”分别咏的是：深柳读书堂、竹子院、梧桐院、葡萄院、桃花坞、耕织轩、菜圃、牡丹台、金鱼池、壶中天、涧阁、莲花池。对于这十二园景据张恩荫先生的考证认为：“可以确知其中十景的具体所在，有六景在后湖周围，两景在后湖西北，另在后湖直北和福海西岸各有一景。具体说就是：‘牡丹台’、‘竹子院’、‘梧桐院’三景，正是后湖东岸自南而北的镂月开云、天然图画和碧桐书院；‘涧阁’正是后湖北岸的慈云普护；‘菜圃’、‘金鱼池’正是后湖西岸的杏花春馆和坦坦荡荡；‘桃花坞’和‘壶中天’都在后湖西北的武陵春色；‘耕织轩’是在后湖直北的水木明瑟；‘深柳读书堂’则是福海西北山水间的双鹤斋即廓然大公一景。还有‘莲花池’可能在曲院风荷或长春仙馆一带，‘葡萄院’则可能在九州清晏一景”。⑰张恩荫《略论圆明园早期形象》对于这十二景所在的考证，笔者大部分赞同，并将笔者查到的出处简要列出，对于不同的看法和增加的范围再另作陈述：

首先“牡丹台”：据《日下旧闻考》“镂月

开云，四十景之一也，原名牡丹台，乾隆九年易今名”。可见“牡丹台”即“镂月开云”。康熙就是在这里首次见到孙儿弘历。

其二“竹子院”：据“雍正七年八月初七日传旨：着（錽作）将五福堂錽金字彩漆匾一面挂在竹子院。钦此。于闰七月二十八日将五福堂錽金字彩漆匾一面，催总胡常保移在竹子院挂讫”。[18]而据《日下旧闻考》：乾隆说天然图画中的“五福堂”之“堂名皇祖所赐也”。由“五福堂”所在推知“竹子院”即后来的“天然图画”。

其三“梧桐院”：“据乾隆元年十二月初二（木作）奉旨：梧桐院内所挂之匾四面，准做“碧桐书院”匾一面，其余三面不必做。”[19]嗣后“梧桐院”改为“碧桐书院”。此外，由雍正九年三月初六日（漆作）知有“碧梧书院”。

其四“洞阁”：据《日下旧闻考》：“慈云普护”有楼三层，刻漏钟表在焉。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杂活作）“圆明园蓬莱州西北角亭子上，‘洞阁’自鸣钟楼上，二处安铜风旗。奉旨：知道了，安罢。钦此”。[20]在《四十景咏图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慈云普护西南三层塔楼上安有铜风旗。

其五“菜圃”：据《日下旧闻考》杏花春馆：“前辟小圃，杂莳蔬瓜”。另据雍正四年六月十五日（油漆作）所载：“‘杏花春馆’匾文一张（系菜圃的）”。

其六、七“桃花坞”和“壶中天”：《日下旧闻考》武陵春色：旧总称“桃花坞”，武陵春色石洞内额为“壶中天”。

其八“耕织轩”：当在“映水兰香”和“淡泊宁静”处。因为，此相邻两处景观主要为体察农耕之处。其中映水兰香有知耕织、贵织山堂等，并祀蚕神；而淡泊宁静有多稼轩、观稼轩、稻香亭等。此外，淡泊宁静以“田字房”著称，而“田”即“农田”之意。所以，雍亲王的《田家诗》也就是“农家诗”的意思。由此可见，将“淡泊宁静”设计成田字形，不仅是出于造型的考虑，还隐喻更深的含义。

其九“金鱼池”：据《日下旧闻考》坦坦荡荡：凿池为鱼乐国。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但是雍亲王的《金鱼池》中却有“甃地成

图2　圆明园四十景位置图
（摘自《圆明园》丛刊第二集）

卐字，注水蓄文鱼”。由此看来雍亲王的《金鱼池》与乾隆时的坦坦荡荡在形态上还是不完全一样。

其十“深柳读书堂”：据《日下旧闻考》“廓然大公”有诗：“深柳偏宜羽客嬉，会心恰当读书时（是处昔又名深柳读书堂）”。再据《日下旧闻考》在“澡身浴德”处也有“深柳读书堂”，此处的“深柳读书堂”应当是从“廓然大公”处移来的。又两处相近，或总称其名。

其十一之“葡萄院”在九州清晏一区虽难以肯定，但当为合理。不论“葡萄院”是否在九州清晏一区，肯定九州清晏在康熙时已经存在确有很多理由。首先，据《日下旧闻考》记载，九州清晏前第一层殿恭悬圣祖御书“圆明园”额。其次，在同一殿内，有联曰：“每对青山绿水会心处，一邱一壑总自天恩浩荡；常从霁月光风悦目时，一草一木莫非帝德高深”，乃“世宗藩邸时所书”，它们说明九州清晏在康熙时已有。另外，乾隆帝在乾隆二十八年的《乔松叹》一诗中有：“清晖阁之前，九株撑偃仰，年将与我齐，从幼看枝放”。[21]由此亦可推知，九州清宴一区在康熙年间已有。

从九州清晏之寓意和后湖九州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考虑，此时的后湖应该不仅仅只是这七

景七州，还应包括另外两景，即上下天光和茹古涵今。以“上下天光”为例，它的东面已有慈云普护，西面已有杏花春馆，北面已有武陵春色，而它置身其间不可能空无一物。另外，不论就其位置，还是形态意象，都与北海的五龙亭的境界异曲同工。因此，作为一区景观，它是后湖的点睛之处；作为观景台“凌空俯瞰”，它也不可或缺。总之，早期的后湖九景不可能不包括“上下天光”一区。

2、关于“莲花池”与“莲花馆”及“长春仙馆”的因缘关系

其十二“莲花池”：张恩荫先生认为“可能在曲院风荷或长春仙馆一带”。仅就在“长春仙馆”这一可能来看，应该是缘于乾隆元年正月十一日活计档的记载。据该档所载：“宫殿监督领侍苏培盛等传旨：圆明园旧莲花馆处所挂‘长春仙馆’匾一面，做黑漆底一块玉铜镀金字，再做黑漆一块，玉对一副。钦此。于本年四月十一日，将做得‘长春仙馆’黑漆匾一面、对一副，栢唐阿六达子持去挂讫”。[22]那么这个旧莲花馆又在什么地方？

图3　濂溪乐处

从《活计档》中反复提到有“莲花馆对西瀑布处三间屋”。我们从四十景图中确能看到“濂溪乐处”西边有瀑布和水口。对此，雍正还拟得“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对联一副。而“濂溪乐处”西边之所以有瀑布和水口，是因为圆明园内的山形水势是由西北而趋东南，故此，有“日天琳宇”、“柳浪闻莺”诸响水处，它说明此处水流落差很大，适于并能够形成瀑布。而“濂溪乐处”与“日天琳宇”仅一山之隔，且有山坳相通，自然可以形成瀑布景观。其实这一瀑布正是“濂溪乐处”的进水口。所以，从山形水系的角度讲，莲花馆就在“濂溪乐处”。

又据雍正五年五月十八日（裱作）所载：“首领太监李统忠交来御笔‘爱莲说’字一张，‘微风送晚凉，妙香静远；斜月映清碧，仙露空明’对一副，系莲花馆床罩上的，传着托表。记此”。[23]可见，从莲花馆有关莲花的对联来看，莲花馆与莲花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乾隆的“长春仙馆”则不然，它虽然四周环水，但它作为一个大的四合院，其庭中只有“有梧、有石”，内中不仅看不到瀑布、山泉，更无莲花可言。所以，后来的“长春仙馆”不可能是那个“旧莲花馆”。相反，“旧莲花馆”的某个屋里确挂有一块“长春仙馆”的匾额。

证明“莲花馆”并非“长春仙馆”最为直接的史料为乾隆三年八月十一日活计档的记载：“乾隆三年八月十一日（油作），太监胡世杰交‘莲花馆’匾十四靣，传旨：将匾本文十四靣交与员外郎常保配做匾十四靣。钦此。‘洁矩’，‘聚远楼’，‘松风阁’，‘慎修思永’，‘会心不远’，‘朝日辉’，‘漱芳润’，‘得月’，‘烟云舒卷’，‘菊秀松蕤’，‘涵虚朗鑑’，‘云锦墅’，‘临象（众）芳’，‘贻兰庭’。”

“于八月十七日，催总白世秀将匾谱持进，交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呈览。奉旨：挑准四字匾四靣、三字匾七靣、二字匾二靣，再将‘慎修思永’匾本文糊锦边做匾一靣，其余照样准做。钦此”[24]。

在这则史料中提到了“莲花馆”匾十四靣，其中着重强调了“慎修思永”。据《日下旧闻考》所载：“‘廉溪乐处’，四十景之一，额为皇上御书，殿檐额为‘慎修思永’”。由于“莲花馆”匾十四靣中和“廉溪乐处”中均有“慎修思永”，由此可以推断“莲花馆”就是“廉溪乐处”。

其余匾额如“涵虚朗鑑”等，据《日下旧闻考》所载：“涵虚朗鑑在福海东，即雷峰夕照正宇，其北稍西为惠如春，又东北为寻云榭，又北为‘贻兰庭’，为‘会心不远’，其南为‘临众芳’，为‘云锦墅’，为‘菊秀松蕤’，

为万景天。(臣等谨按)涵虚朗鑑，四十景之一。额为皇上御书。旧悬湖西澄虚榭，后移置湖东雷峰夕照轩内”。[25]由此推知“涵虚朗鑑”等匾额由莲花馆移出后，先到西澄虚榭，后到雷峰夕照。

至于乾隆将“旧莲花馆处所挂‘长春仙馆’”的匾重做一遍之后，并不一定挂在“旧莲花馆处”，即“濂溪乐处”，而是挂在后来的“长春仙馆”。根据需要将“长春仙馆”牌匾与“长春居士”称谓合二为一未尝不可，而改变名称或添改建筑对于乾隆来说是一件十分经常和随意的事情。而且，乾隆在《题长春仙馆》中也有这样的诗句为证：“旧室何来仙馆号，长春缘识圣人名”。由此可见乾隆读书时的“旧室”起初并非叫长春“仙馆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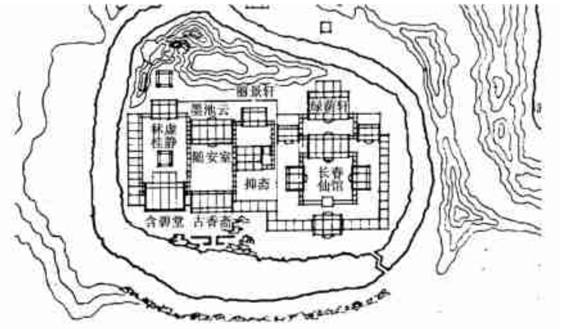

图 4　长春仙馆平面图（摘自《圆明园》丛刊第二集）

肯定了“莲花馆”的所在，不仅把“莲花馆”由圆明园最南端的长春仙馆搬到了圆明园北部的濂溪乐处，也将康熙时期的圆明园由水木明瑟再进一步向北推朔了 100 米。

关于此组诗的写作年代笔者亦赞同张恩荫先生的推断“大约成诗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因为在《世宗宪皇帝御制诗文集》七卷中，“园景十二咏”诗同《皇父御极之六十年》一起编在第六卷中。

3、关于佛楼和西斗坛

在《雍邸集》有一首《寒夜》诗，它编排在《皇父御极之六十年》诗的后面，从诗文的内容看，咏的也是圆明园。所不同的是诗中特别注释一句：“东磬传清梵，西钟度紫坛。(邸第有东佛楼、西斗坛)”。关于圆明园的佛楼和斗坛据雍正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记事录）所载：“内务府海望奉上谕：‘朕到圆明园在深柳读书堂住，但佛楼斗坛太远，在深柳读书堂后新盖太平台下将行龛斗坛设立，再量地式填盖板房几间，应添院墙者添院墙，如何收拾之处尔画样呈览。钦此’”。[26]佛楼或指日天琳宇，但诗中却说东佛楼，与诗有些不符。至于斗坛，据雍正四年六月十五日（油漆作）所载：“恩光仁照匾文一张（系斗壇的）”。[27]又据《日下旧闻考》：“广育宫奉碧霞元君，殿额曰恩光仁照”。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斗坛在瑞应宫。可是不论在广育宫，还是在瑞应宫，日天琳宇这座“佛楼”都在它们的西面而不是东面。如按《寒夜》诗“邸第有东佛楼、西斗坛”说法，“邸第”中的佛楼非指日天琳宇，而是在圆明园的东部另有所在，而且两者的距离不会很近。不论怎样潜邸时的圆明园之大，致使雍正礼佛、拜斗坛都感觉太远了。

4、关于四宜堂所在及年代的探讨

除《雍邸集》外，雍正即位后所写诗全部收到《四宜堂集》中，而这个“四宜堂”是圆明园中极重要的一个场所，它的地位与作用相当于紫禁城中的“养心殿”，是雍正召见大臣、处理政务的宫殿。这也正是为什么雍正将其即位后所写诗集命名为《四宜堂集》的原因。但是，四宜堂在圆明园的何处，似乎一直未给出圆满的答案。有的学者认为四宜堂就是四宜书屋，笔者认为多有不妥。因为，四宜书屋又称安澜园，是乾隆仿海宁安澜园改建。它在圆明园的北大墙边，是一处观景休闲的所在，不适于召见大臣、处理政务。

从史料记载与现存实物比对来看，笔者认为四宜堂在圆明园的勤政亲贤的保和太和一区最为合理。首先，养心殿的西暖阁有勤政亲贤额，而圆明园也有勤政亲贤殿。不仅如此，勤政亲贤一区的保和太和殿“其西暖阁亦有勤政亲贤额”。[28]此外，据《日下旧闻考》所载：“保和太和殿壁恭悬御书圣训四箴，箴已载养心殿卷内，不备录”。查养心殿卷确有“御制养心殿四箴，我皇考圣训曰：敬天法祖，勤政亲贤，事止四端，义该万理”。[29]从匾额与“恭悬御书圣训四箴”相同可见，圆明园的保和太和与紫禁城的养心殿的功用是相同的。其二，据活计档雍正四年正月十五日记载：“将四宜堂‘一室春和’匾持出，挂在养心殿东暖阁内。再照此文字收小些的匾补做一面，挂在四宜堂内。钦此”。[30]由此可见，四宜堂与养心殿

的也是相通的。其三，从建筑格局上看，养心殿是工字房。四宜堂也有穿廊和后殿，而这种格局在圆明园中只有勤政亲贤一区的“保和太和”最为明显。

基于以上的比对，我们可以推断四宜堂在圆明园中的勤政亲贤的保和太和一区。这一位置与畅春园中的“澹宁居”颇为相似。然而，至雍正八年八月初三，内务府总管海望等奉旨：“‘四宜堂’匾着挂在四季房朝西临河厅，四宜堂另作一匾，名‘乾惕堂’”。[31]“朝乾夕惕”是雍正皇帝十分在意并用以自警的座右铭，用“乾惕堂”来代替“四宜堂”更说明早期的“四宜堂”就在勤政亲贤、保和太和一区。而“四季房朝西临河厅”很像是四宜书屋的涵秋堂，但那是雍正八年以后的事了。

既已明确了四宜堂的位置，接下来便是时间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它可能始建于雍正三年，但是从雍正《四宜堂集》中《暮春四宜堂咏怀》一诗来看，它的始建年代或许更早。该诗如下：

暮春四宜堂咏怀

花繁如锦草如茵，雨细风轻物候新。
朱邸舞筵成往事，斑衣戏彩久凝尘。
万几宵旰忙中趣，百岁光阴梦里真。
不问春归何处去，惟听燕语报芳辰。

诗中“朱邸”通“潜邸”、“藩邸”，均指雍正未即位之前所居。由于该诗咏怀的是“暮春四宜堂”，所以，很明显“朱邸”指的就是未即位之前的圆明园中的“四宜堂”。只不过那时的“四宜堂”是宜歌、宜舞、宜宴、宜乐之所。

既已确定了四宜堂为勤政亲贤、保和太和一区；又确定了四宜堂为康熙六十一年前潜邸时已经存在。就否定了普遍认为它始建于雍正三年之后，同时也否定了普遍认为早期圆明园仅在后湖周围的说法。说明此时的圆明园其规模布局由南到北已基本完成。

综上可知，圆明园在康熙末年，已经由南从保和太和一区到廉溪乐处共 900 米以上，东西从武陵春色至廓然大公有约 800 米。此时的圆明园即便不算福海一区，它所覆盖的面积也有约 72 公顷（合 1000 余亩）。这个面积甚至比康熙 60 公顷（合 900 亩）的畅春园还要大。对于圆明园早期规模，张恩荫先生曾多次提出：“康熙年间圆明园的规模已远远超出以后湖为中心的六百亩范围。至少东西宽 750 米，南北长 1100 米，占地 1200 亩”。[32]

（四）从历史背景出发对康熙年间圆明园规模的质疑

对于圆明园的主人和始建年代的考察，还可从其建筑规模及耗费等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四皇子的角度来看，圆明园的形制气势乃为帝王苑囿所有，在严格的封建礼制下，这绝非是雍亲王藩邸所敢僭越的。可是，至康熙末年，雍亲王的圆明园不论从规模、功能还是豪华程度都已经超过康熙的畅春园。

其次，即便雍亲王不怕僭越礼制而想把圆明园修建得瑰丽宏敞，他也不见得有那样财力。据王致诚讲：“去年（1742）我看到这块地方建造起一座小宫殿，皇帝的一个表兄花了六十万，室内装潢还不计在内，因为这笔费用不计在他的账上”。[33]而圆明园中这样的小宫殿又不知有多少。可是据雍正讲：当年几个兄弟分府时，每人分得二十三万两，这恐怕还要包括建早期四贝勒府雍和宫的费用。在康熙四十六年，四皇子胤禛同其他六位成年皇子一样，都是赐地建园。所谓赐地建园，名义上是赏给一块地方，实际上是兄弟们自掏腰包买地建房，在这当中四阿哥没有丝毫特殊。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后来的圆明园是雍亲王从兼并其他皇亲国戚的藩属赐园而来，可是，在康熙六十一年之前，从诸位皇子的地位来看，雍亲王是没有资格吞并其他皇子的藩属赐地。如果说兼并，那也是雍正即位后的事情。比如据《永宪录》所载雍正二年：“廉亲王府与上藩邸相连。群臣请升潜邸为宫。廉亲王府不合相并。上以废安亲王空府与之。奏于六月十二日迁移。上谕：妃阿母亲亦系年迈，于此盛暑之时搬移，万一因暑少有疏忽，廉亲王如何担得住？且王属下人等于此盛暑之时，疏忽一人，俱关朕之声名，故暂停止”。[34]由此可见，雍和宫是兼并廉亲王府而成，可是，我们至今尚不能证明康、雍时期的圆明园是兼并那个亲王的花园而建。

再从康熙的角度来看，由于立储的失败，给晚年多病的康熙带来无限烦恼和忧伤，虽四

十八年复立，并分封诸皇子，然五十一年又废太子。所以，此时康熙帝对任何觊觎皇位之人都高度警觉和反感，为此处治了很多大臣。在这种情形下，很难想象康熙会为四皇子大兴土木建圆明园。

此外，再从建园的角度来看，此前已有畅春园在先，再有康熙四十八年承德避暑山庄刚刚完工，自康熙四十九年起至康熙五十六年孝惠皇太后病逝，这八年中每逢入夏，康熙都要奉皇太后去热河避暑。况且，在此之前孝惠皇太后已有淡泊为德行宫。因此，在四十八年至六十一年间，不论是为皇太后还是为雍亲王，乃至于为自己，康熙帝都没有必要再动用举国之财力，大规模兴建圆明园了。

故此，很多学者推断规模宏大的圆明园为雍正在位十三年全力营造。应该说，认为圆明园为雍正在位十三年全力营造的说法是一个不得已且十分合理的说法。可是，对于在位十三年全力营造一说，一方面史料不充分；另一方面对此又有许多否定的记载。

(五) 昭梿的《啸亭杂录》对大规模圆明园营建于雍正在位的十三年的否定

从目前所发现的史料来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有关几处景区内装修和匾额的题写，此外再很难见到雍正大兴土木的记载。这一方面有人为地销毁因素；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因为雍正的确没有大规模的扩建。正如昭梿《啸亭杂录》所载："余尝闻内务府司员观豫言，查旧案档，雍正中惟特造风、云、雷、雨四神祀，以备祈祷雨阳外，初无特建一离宫别馆以供游赏"。[35]"宪皇即位后，综核名实，罢一切不急之务，如河防、海塘等巨费，皆罢不修，体恤民力。特置封桩库于内阁之东，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储其内，末年储银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仓庾充实，积储可供二十余年之用，真善为政理也。"[36]对此，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溢美之词。可是我们看到昭梿同时也不无批评地指出"康熙间，仁皇宽厚，以豫大丰亨以驭国用，故库帑亏绌，日不敷给"。[37]从昭梿贬康熙、颂雍正的评价来看，昭梿所说并非溢美之词。同时也说明了圆明园主要应为康熙年间建造。

当然，以上所述并不否认雍正在位期间圆明园仍有修建，仅就圆明三园中的圆明园来讲，不仅雍正朝在持续修建，甚至乾隆，乃至咸丰朝都在一直不断的修建。只是这些修建都是在康熙朝的大致范围内的添建或改建，而非扩建（注：笔者所指不包括长春园和绮春园）。所以，我们认为雍正讲"时逾三载……始命所司，酌量修葺。亭台丘壑，悉仍旧观。"[38]这句话是可信的，而那种认为规模宏敞的圆明园是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间全力营造的说法，只能是今人的推测而已。

总之，我们既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规模宏大的圆明园确实在康熙六十一年前已经存在。这不论是雍亲王的《园景十二咏》，还是雍正的《圆明园记》，以及昭梿的《啸亭杂录》所载均可证明；然而，从历史的客观背景出发我们又不能不对此提出质疑。那么如何解决康熙年间圆明园已初具规模的客观存在的史实与人们主观认知难以统一的矛盾呢？

事实上，我们一旦肯定了圆明园早在康熙晚年就已经基本建成，那么，它就不得不使我们怀疑圆明园是否为雍亲王所建。而如果不是胤禛所建，那么它又可能是为谁而建？

二、以"新花园"为圆明园前身的营建始因的考证

(一) "新花园"的所在方位应是圆明园的所在

在研究胤祉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的奏折时我们还注意到，不论是在正月十八日的奏折，还是在三月二十日的奏折中均提到一个不为后人所知的"新花园"。而康熙赏给七个皇子建房的空地是在"(畅春园) 北面'新花园'以东"。也就是说建房"空地"以西、畅春园以北已经有一个"新花园"。

已往我们在引证这段史料时更多地只是注意到胤禛在这一年建了房，而忽略了"新花园"者为何。它不仅是七位皇子建房选址的坐标，而且，从所处的位置上看，奏折中说"北新花园迤东空地"所表达的方位是畅春园的正北。据《日下旧闻考》所言"圆明园在畅春园之北"，"距畅春园里许"。而畅春园"因在圆明园之南，亦名前园云"。对此，我们可以从

各种圆明园与畅春园位置图中看的很清楚。由此可见，这个“新建花园”正处在圆明园的所在方位。

(二)“新花园”当为孝惠皇太后所建

我们注意到“新（建）花园”一词首先出现在康熙的降旨中，既然是从康熙口里讲出来的“新花园”，那么它就不是一般的王公大臣的“新建”，而是区别于他自身已有的畅春园的“新建”。比如《日下旧闻考·卷七十八·西花园》中就曾有《圣祖御制畅春园西“新花园”观花诗》。我们知道畅春园西边的这个“新花园”是为太子而建，那么畅春园北边的这个“新花园”是为谁而建？

从先于七位皇子而建园可知，此园的主人年长于七位皇子，从优越的地理位置来看，可知园主人的地位高于七位皇子。再从奏折的表述来看，“新花园”与“七位皇子建房是以一当七”，可见“新花园”规模相当大。如果这个“新花园”就是圆明园的话，那么从其气势与规模上看，我们想到的第一人应当是康熙帝的嫡母孝惠皇太后。孝惠是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谥号，蒙古族人，孝庄的侄孙女。不论是从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出发，还是以“孝治天下，思表率臣民，垂则后裔”[39]的治国理念等都使得孝惠皇太后自康熙二十六年孝庄太皇太后去世后，在康熙帝的心目中和在当时的大清国的礼制等级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并使她很自然地成为“当今最尊者”[40]。这一点从承德避暑山庄于康熙四十八年建成后，康熙每一年都要奉皇太后去承德避暑而从没间断可以得到证实。对此胤祉在康熙四十九年六月的奏折是这样表述的：“皇父乃至圣至孝之人，对太后祖母竭尽恭孝，实亘古所未有。父皇选择风景佳地，建造避暑宫殿，特请太后祖母前去游玩观赏。太后祖母乘兴而往，沿途每宿一地，皇父无不亲自往迎，备极周全。太后祖母大喜，而且更合于皇父之孝心。臣等闻之，欢欣雀跃”。[41]从这个奏折中可见孝惠皇太后地位的尊贵。

此外，从康熙二十八年宁寿新宫的营造也可见一斑。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谕大学士、内务府总管：“朕因皇太后所居宁寿旧宫，历年已久，特建新宫，比旧宫更加宏敞辉煌，今已告成，应即恭奉皇太后移居。可传谕钦天监，敬谨选择吉辰，礼部详考典礼以闻。”十二月初三日，以此日皇太后移居宁寿新宫，遣都统化善告祭太庙。初四下午未时，孝惠正式移居，“仪仗全设”，玄烨“率王以下，内大臣、侍卫等行礼。”[42]由此可见皇太后回宁寿新宫这件事是多么重要，礼仪又是何等的隆重。

宁寿宫一直是孝惠皇太后所居住的宫殿，也是清朝入主紫禁城以来对明故宫改建规模最大、次数最多的建筑群。它可称为宫中之宫苑。此次改建当始于康熙二十七年。既然康熙能在紫禁城内为孝惠皇太后修建宫苑，那么，他是否也应该为皇太后在畅春园内或周围修建一座避暑的离宫？

(三) 孝惠皇太后的“澹泊为德行宫”考

从《康熙起居注》中我们发现在康熙四十五年（注：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缺失）中，每当康熙驻跸畅春园，总是先到一个园林史中从未提及过的“澹泊为德行宫”处给皇太后问安。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改到诣“镜峰”请安。这说明在康熙四十五年前康熙帝确实为孝惠皇太后建造了行宫。那么，问题是这个“澹泊为德行宫”和“镜峰”到底在哪里？它与畅春园和圆明园以及“新建花园”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从《康熙起居注》的行文上看，“澹泊为德行宫”和“镜峰”似乎就在畅春园中，对此有的学者也如是认为。可是，令我们疑问的是，如果皇太后的离宫“澹泊为德行宫”和“镜峰”就在畅春园的某处，那么乾隆就会说畅春园的某处是圣祖奉宁寿宫（指孝惠皇太后）的“澹泊为德行宫”和“镜峰”的旧址云云，且《日下旧闻考》亦应照录无误。可是，《日下旧闻考》卷七十六畅春园中对此只字未提。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澹泊为德行宫”和“镜峰”不在畅春园内。

此外，若依乾隆在《敬题松鹤斋》19 诗序中所说：“昔我皇祖于山庄中奉宁寿宫处名之曰‘松鹤清越’，我圣母为是先征所憩，避弗敢御”[43]的话，那么，凡是乾隆奉其圣母皇太后在畅春园住过的地方，比如寿萱春永、纯约堂、蕊珠院、观澜榭、集凤轩等一些重要景区就都不是康熙奉皇太后的“澹泊为德行宫”

的行宫所在。可是如果畅春园除去以上这些也就所剩无几了。

再从《康熙起居注》的遣词造句来看，笔者发现每当康熙帝到“澹泊为德行宫”和“镜峰”给皇太后请安时总是用“诣”字，如“诣镜峰请安”，多年未有丝毫变化。而凡是在上元节时康熙到畅春园中的某处给皇太后请安则用“于”字。如：

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四日，“上于‘闲邪存诚’问皇太后安”。

正月十六日，“上于‘九经三事’问皇太后安”。

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初八日，“上于‘露华楼’问皇太后安”。

正月十六日，“上于‘九经三事’问皇太后安”。

正月十七日，“上诣镜峰问安”。

康熙五十六年三月初三日，“上于‘雅玩斋’问皇太后安”。[44]

在这里“于”当“在”讲，而“诣”则有专程赴尊长处拜谒之意。此二字之别绝非“文字雅重”的起居注官随意而为。由于闲邪存诚、九经三事和雅玩斋就在畅春园中，所以只用“于”字即可，而无须用“诣”字。相反，由于“澹泊为德行宫”和“镜峰”不在畅春园中，故须用“诣”字而不能用“于”字。

以上史料说明只有在上元节、“千叟宴”和“三月三”那样的盛大节日皇太后才被接至畅春园中，此外，均是在自己的离宫——“澹泊为德行宫”和“镜峰”中接受康熙帝的请安。

在用字上与以上不同的还有两种特殊情况：一种情况是，康熙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之后史料缺失）康熙给太后请安既不用“诣”，也不用“于”，而是直接用“问”。如某日“巳时，上问太后安。”两年来一直如此。此时，孝庄太皇太后刚刚去世，孝惠皇太后的“澹泊为德行宫”还未建成，故康熙将皇太后接至畅春园中住在一起，所以只须用“问”即可，而无须用“诣”和“于”。

另一种情况是，皇太后自五十六年十月初三在热河的“松鹤清越”过完万寿节回来后病倒。在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这三天有“上至畅春园请太后安”和“上至闲邪存诚请太后安”。如果“澹泊为德行宫”和“镜峰”就在畅春园中，那么此时太后应该在自己的宫中养病更为方便适宜，何必要住在闲邪存诚，答案只能是“镜峰”不在畅春园中。

从圆明园和畅春园的使用功能上来看“澹泊为德行宫”，应该就是圆明园。因为“乾隆四十二年更进一步下旨：‘若畅春园，则距圆明园甚近，问安视膳，莫便于此，我子孙当世守勿改’”[45]由此可见，两园在使用功能上一则为皇帝所居；一则为皇太后所居。乾隆帝尚且能如此，康熙帝为何不能如此？只是康熙与乾隆在圆明园与畅春园的使用上掉个个而已。

综上所述，在时间上，皇太后的“澹泊为德行宫”和在畅春园以北的“新花园”均在康熙四十六年之前同时存在；在空间上，皇太后的“澹泊为德行宫”和“新花园”均在畅春园周围同时存在；在使用功能与地位上，“新花园”或圆明园与皇太后的“澹泊为德行宫”的地位相同。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皇太后的“澹泊为德行宫”和畅春园北面的“新建花园”应该指的就是一处，即后来的圆明园。

（四）从叶陶寻复召开始探讨圆明园始建年代

圆明园既是康熙帝为皇太后所建，那么它始建于何时呢？这要从畅春园的设计师叶洮说起。

首先，据《清史稿》叶陶传，“叶陶，字金城，江南清浦人，本籍新安。善画山水，康熙中，祗候内廷。奉敕作畅春园图本称旨，即命佐监造，园成，赐金驰驿归。寻复召，卒于途”。[46]此外，《青浦县志》也有近似的记载：“叶洮（一作陶）字金城，有年子世其画学。康熙中供奉内廷，诏作畅春园图，称旨，奉命监造，以病乞归，赐金乘。传时人荣之。寻复召，得疾，卒于途”。[47]从时间先后来看，《青浦县志》早于《清史稿》。由此可知，畅春园是由叶洮设计监造的。对此，曹汛先生在《叶洮传考论》中则认为“叶洮之奉召绘畅春园图显然应该是园子建成以后的表现图，相当于现在的竣工图，而不是建园之前的设计图”。[48]对曹先生的看法，笔者深有异议。首先，叶洮虽擅绘画，但更擅造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能

画畅春园“表现图”者比比皆是，而能造畅春园者非叶洮莫属。康熙需要的恰恰是能造园的叶洮。所以，如果叶洮没能在设计和建造畅春园中贡献自己的才智，而仅仅是画了一张“表现图”的话，即没有体现出叶洮造园家的价值，同时康熙也不会大加赏赐。

从以上两则正史所载的史料可知，叶洮荣归故里当在畅春园建成之后。而畅春园的建成时间一般认为应在康熙二十六年二、三月份。那么“寻复召，卒于途”又在何时呢？对此，再“据揆叙《益戒堂自订诗集》卷一《夏日园居杂兴八首》其七云：‘指点园林旧画师，天涯孤棹再来迟，伤心盛夏成迁逝，回首芳春忆别离。累石崚嶒犹故物，种桃天袅又新枝，霸魂零落知何在，归向华亭鹤唳时。’诗后自注云：云间叶洮为舍家筑园，归后再至京师，殁于涿州。”[49]对于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曹汛先生考证的结果是在康熙三十一年。据此曹汛先生认为“由此可见，叶洮的逝去和揆叙作诗伤悼他的迁逝，前后衔接，论情论理都是同一年的事”[50]。对此，笔者认为不尽如此。首先，我们同意曹汛先生依据查慎行《相国明公新筑别业于海淀旁既度地亦邀余同游诗以记之》诗为康熙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后作，进而承认“当时叶洮正为明珠家经营规划自怡园”。但笔者不认同叶洮去世和揆叙作诗伤悼他的去世是同一年的说法。因为，自康熙二十六年二、三月份叶洮开始为明珠经营规划自怡园，到三十一年揆叙夏日园居，这中间历时六年，而叶洮不可能为明珠的自怡园指点经营那么久。况且，康熙二十七年明珠始遭弹劾罢政。所以，明珠“大治园亭，宾客满门下”[51]的时间应当在康熙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之间。至于叶洮为自怡园规划的时间也就在二十六年三月芳春为止。而“寻复召”及“伤心盛夏成迁逝”的时间亦当在二十六年的盛夏。这与康熙三十一年揆叙在回忆纪念叶洮是写《夏日园居杂兴八首》不是同一年。所以，在诗的第一句揆叙用了“旧”字。试想如果揆叙写诗与“芳春别离”“夏成迁逝”都是发生在三十一年的当年的话，那就不必用“旧”字，“旧”有陈年往事之意。

至于为何“寻复召”，曹汛先生认为“自然还是请他回来监造畅春园的整治增建工程”。[52]对此，笔者亦有不同看法。叶洮是以擅长园林的山形水系的设计与规划而出名且因身体不好“以病乞归”。所以，康熙急于复召叶洮赴京，不应该只是修修补补的小事，而是另有新建的大工程非他不可。那么这个继畅春园之后的又一皇家御苑工程应该是哪一个呢？

（五）从畅春园非为孝庄太皇太后而建探讨圆明园始建年代

自畅春园建成之后，王公大臣便开始纷纷建郊园别业，那么这当中有没有孝庄太皇太后和嫡母孝惠皇太后的行宫御苑呢？对此一般认为畅春园是康熙为孝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营建的，这在前面淡泊为德行宫的考证中已得出过否定的结论。事实上不仅如此，甚至孝庄太皇太后在有生之年未曾踏进过畅春园的大门。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畅春园竣工之后，最先入住的是康熙本人和太子胤礽而不是孝庄太皇太后和嫡母孝惠皇太后。至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十，皇太子对汤斌说：“太皇太后明日幸畅春园，皇父于五鼓还宫恭迎”。六月十一日，孝庄太皇太后“幸”畅春园，但具体情况未载。可是，第二天“十二日。早，上迎（孝惠）皇太后，送皇太后至玉泉山宫内”。从十二日康熙直接将孝惠皇太后迎送到玉泉山宫内可推知，先前到来的孝庄太皇太后也是直接移驻玉泉山，而没有驻跸畅春园。因为，按着当时的礼制和惯例，两个人的待遇、等级、仪仗几乎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在行动上太皇太后总是要比皇太后先一天到达。

在随后的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初一日这十五天内，《起居注》又没有了康熙御畅春园听政的记载，可知这一段时间康熙是在玉泉山侍奉祖母太皇太后和嫡母皇太后。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正值盛暑之时两位老人为何于七月初一、初二，又先后直接回到紫禁城内，而没有到畅春园避暑与儿孙同乐。后来，康熙怕二位老人中暑，于“七月十一日早，上自畅春园诣太皇太后宫问安，恭请避暑，太皇太后移驻（西苑）五龙亭。”从这段翔实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两位老人不仅没有移驻畅春园，而且似乎是带着不满而来，怀着不快而去。从史料记载

来看，这是孝庄太皇太后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路过畅春园。五个月后，孝庄太皇太后去世。

总之，畅春园并非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而建，孝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对此表示了不满。而对于康熙来说，太皇太后没有住进畅春园也应该是一件莫大的憾事和失误，而这遗憾可能就是康熙帝萌发为皇太后营建淡泊为德行宫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康熙帝为何急于在康熙二十六年夏天“寻复召”叶陶返京的原因所在。

同时，此事也促使康熙帝于康熙二十六年夏天开始筹划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营建行宫御苑。可是，由于孝庄太皇太后的去世影响了建园的进程。转过年来，康熙在为太皇太后办完丧事之后，自康熙二十七年始，一方面，在紫禁城内大张旗鼓地为嫡母孝惠皇太后营建宁寿新宫；另一方面，于六月初三日康熙带着皇太后一起驻跸畅春园，至七月十二日，共三十八天。对此，《康熙起居注》是作如下记载：“是行部院各衙门章奏每日送交内阁，内阁转送畅春园听理”。不仅如此，在此期间有二十七天只有“问安”而无任何朝政记载。康熙二十八年的情况也大抵如此。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康熙帝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不让大臣面奏？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康熙开始全力为嫡母孝惠皇太后营建行宫——“澹泊为德行宫”即后来的圆明园。始建时间就应从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初三日算起。

综上所述，本文最终的结论是：圆明园是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七年为嫡母孝惠皇太后在畅春园北面营建的一座大型的离宫御苑。它起初对内臣称为“淡泊为德行宫”，后改为或扩建为“镜峰”。它就是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胤祉奏折中康熙所说畅春园“北新（建）花园”。至康熙五十六年孝惠皇太后去世后，康熙才转赐给雍亲王居住。因此，才有雍亲王写于五十八年前后的雍邸园景十二咏；才有于六十一年康熙在牡丹台见弘历一幕；才有雍正的“藩邸所居，赐园也”之说。

这一结论解决了一个困扰园林史学界一个困惑，那就是，造园本是达官贵人的一件风雅之事，从选址造园，到题写匾额联对都离不开文人墨客的提炼与升华，如此才是中国的园林文化。可为什么胤禛的圆明园园景十二咏中的景名却那么土、俗，如葡萄院、竹子院、梧桐院、牡丹台等。这既不符合中国造园艺术所追求的含蓄、风雅、深邃之意境，同时，也不是雍正的风格。原因就在它的前主人是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孝惠皇太后。其实这些园中园不见得没有雅称，只是老太太觉着这么叫顺口。

这一推论还有一个非常可信的人证，那就是清末名士、史家王闿运的《圆明园词》，词中有“‘佛城舍卫散诸方’，其注曰，园中舍卫城旧供千佛，自康熙以来，凡进佛祝寿及皇太后上寿，造佛像，皆送其中。董监云：几十余万尊，皆为民人所毁也。至同治九年犹有得之井中，寄库一夜，又为胥吏盗换之”。[53]之所以说它是可信的人证，是因为还在圆明园没有被完全放弃之前，王闿运携友人一起到访过圆明园，此行深得留守太监们的欢迎和款待，交谈中太监自然说了许多耳闻目睹的陈年往事，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感慨而谈故为可信。如果圆明园在康熙年间为四阿哥胤禛的赐园，为什么“自康熙以来，凡进佛祝寿及皇太后上寿，造佛像，”皆送四阿哥的赐园中。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早期的圆明园为康熙的嫡母孝惠皇太后所有，也说明舍卫城在康熙年间已有，并非雍正年间添建。对此，在《王致诚教士给达索先生的信》中也这样讲：“这座小城是康熙朝开始建造的”。[54]至于雍正年间确题写过匾额，应理解为改写，就如同乾隆大量改写雍正题写过的匾额和改建雍正时建的景区一样，雍正也要改写孝惠太皇太后时期俗不可耐的称谓。

至于在康熙四十六年正月，胤禛等七位皇子在畅春园北所建之“房”，以及康熙曾在四十六年十一月去过的皇四子胤禛花园并非在圆明园的位置上，而是在水磨村即后来的长春园以东或畅春园东北一带。故此，可以说四阿哥胤禛在康熙四十六年所建之房与圆明园无关。这与康熙从四十六年至五十六年这十年间未有去过胤禛花园的记载，直到五十八年以后才接连去过四次相吻合。所以，本文在既否定圆明园是康熙帝于康熙四十八年为四皇子胤禛而建之说的同时，又承认在惠皇太后去世后，康熙帝确实将皇太后的圆明园赐给雍亲王，这便是圆明园“赐园也”的来历。

①张恩荫：《略论圆明园早期形象》，《圆明园研究》第六期，http：//www. yuanmingyuanpark. com/zy/yj10. htm。

②④㉕㉘㉙㊳（清）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12页，第1321页，第1373页，第1331页，第231页，第1322页。

③（清）朱彝尊编：《日下旧闻》，康熙二十五年。

⑤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1页。

⑥（清）弘历：《御制圆明园图咏》，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御制诗跋二。

⑦张恩荫：《略论圆明园早期形象》，《圆明园研究》第六期，http：//www. yuanmingyuanpark. com/zy/yj10. htm。

⑧王戎笙：《清代全史》，第四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078条，胤祉奏请指定建房地折。

⑩㊾焦雄：《北京西郊园记》，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⑪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圆明园》丛刊第四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226页。

⑫杨珍：《反太子派成员综述》，http：//tieba. baidu. com/f？kz＝113916100。

⑬张宝章：《圆明园始建年代的探讨》，《圆明园研究》，第十期，http：//www. yuanmingyuanpark. com/zy/yj10. htm。

⑭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第284页。

⑮㊽㊿(52)曹汛：《叶洮传考论》，载于《建筑师》2005年第一期。

⑯曹汛：《自怡园》，《圆明园》丛刊第四集，第226页。

⑰张恩荫：《略论圆明园早期形象》，《圆明园研究》第六期，http：//www. yuanmingyuanpark. com/zy/yj10. htm。

⑱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12页，第1247页。

㉑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圆明园》丛刊第三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㉒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44页，第1181页。

㉔㉖㉗㉚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59页，第1254页，第1176页，第1175页，第1217页。

㉜张恩荫：《圆明园变迁史探微》，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㉝张恩荫等：《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㉞（清）萧　：《永宪录》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188页。

㉟㊱㊲〔清〕昭梿：《啸亭杂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页，第8页，第9页。

㊴《清圣祖实录》，第133卷，第7—8页。

㊵㊶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61页，第62页。

㊷㊸㊺贾珺：《清代离宫御苑中的太后寝宫区建筑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

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45—2364页。

㊻(5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25页，第10225页。

㊼光绪《青浦县志》卷22：叶洮传。

(52)张驭寰：《圆明园里的舍卫城》，《圆明园》丛刊第五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53)张恩荫、杨来运编著：《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页。